

# 墨家的時代精神

陳榮波\*

## 綱要

前言：

一、墨家的時代精神

- (一) 兼愛的淑世精神
- (二) 明理的辯論精神
- (三) 勤勞儉樸的績效管理
- (四) 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
- (五) 崇尚和平的大勇精神

二、結語：

關鍵字：兼、兼愛、周愛、盈愛、盡愛、誹、止、別、勇、義政

---

\*本文作者是東海大學哲學系專任教授。

## 一、前言

科聖<sup>1</sup>墨子萃取儒家至聖先師孔子思想精髓<sup>2</sup>而開創出體系輝宏磅礴的墨家轟動一時，曾經成為顯學，後來由於亞聖孟子嚴厲的批判<sup>3</sup>與誤解，導致墨家一落千丈。

在中國哲學思想發展中，雖然墨子的功利思想有影響到法家集其大成韓非子「功利現實」思想以及漢代雜家淮南子思想，不過只是曇花一現，未成氣候，直到清代崇尚科技武器等科學思想，又加上當時梁啟超撰寫墨子著作之鼓吹，於是墨家才再度又興盛起來。現今我國非常重視自然科學帶動了墨家又造一波學術研究之高潮。

## 二、墨家的時代精神

我們知道，真理是亙古不移的。雖然時代會變遷，但墨家的時代精神是不會改變的。墨家的時代精神是什麼？這是本文所要探討的課題。本人認為墨家非常合乎現今時代潮流，它的時代精神頗具有時代感，分述五點說明於下：

---

<sup>1</sup> 參閱李殿仁著《墨家與當代軍事》頁1：「在我國先秦諸子中有許多對中國的傳統文化影響至深至遠的“聖人”。其中，眾所公認的，一是“文聖”孔子，他主張和為貴，二是“兵聖”孫子，他主張“兵為上”。還有一位文武兼備，和“武”共濟的聖人，也崇尚科學，因而被譽為“科聖”。」（北京：中國書局 1997）。

<sup>2</sup> 參閱陳廣忠注釋《淮南子譯注》〈要略篇〉云：「墨子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」頁 1005，長春：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。

<sup>3</sup> 參閱謝冰瑩等編譯《新譯四書讀本》頁 453，在〈滕文公下〉篇中孟子云：「聖王不作，諸侯放恣處士橫議，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。天下之言，不歸楊則歸墨。楊氏為我，是無君也；墨氏兼愛，是無父也；無父無君，是禽獸也！……無父無君，是周公所應膺也。我亦欲正人心，息邪說，距詖行，放淫辭，以承三聖者，豈好辯哉？予不得已也。能距楊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。」台灣：三民書局 1997

## (一) 兼愛的淑世精神

墨子雖然出身於平民工匠，但它的頭腦充滿著智慧與愛心。他的學說是以拯救全人類作為出發點，揭櫫「以人類一律平等（不分男女貴賤老少婦幼）的同胞愛為其核心」的兼愛，發出獅子吼的正義之聲，「摩頂放踵以利天下」<sup>4</sup>，走遍天涯海角，解決世人的苦難，確是一位傑出的偉大哲學家。他所開創的墨家可分為前後兩期的不同看法。他的前期思想對兼愛的看法是基於「非攻」立場，反對別愛（人與人之間不相愛）。他認為「兼愛」一詞可說是「兼相愛交相利」的意思。大家只有在平等、互利、互愛、互惠的相互關愛下，人類才會和平、才會幸福快樂，甚至社會才會繁榮、國家才會富強。到了墨家後期（稱為「墨辯」），墨學把「兼愛」再做更深層的思想發揮，其內容有兩點：（1）指出體愛與兼愛之相互關係：何謂「體愛」？姜法曾先生提出：「後期墨家選對墨子所主張的“視人若己”，“為彼猶己”的兼愛原則作了進一步的發揮，提出“仁，體愛也”，作為處理愛人與愛己的原則。所謂“體愛”就是人與己為一體。認為我愛別人，別人也愛我自己，以體現了墨子所主張對愛的對等互報原則，並對利愛與體愛加以區別。……墨辯提出的“體愛”之利他精神是更進一步發展了墨家的兼愛思想。」<sup>5</sup>我認為在上文中所謂「利愛」是一種自私自利、有條件的別愛，而「體愛」是指人與己的人類同胞愛，無條件、無私利的互為一體之愛。因此，「體愛」與「兼愛」之關係是說「體愛」是一種在人類

<sup>4</sup> 同<sup>3</sup>頁 628〈盡心上篇〉孟子曰：「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，為之。」

<sup>5</sup> 姜法曾著《中國倫理學史略》頁 56，北京：中華書局出版 1991。

的同類中，體現出部分的個人與整體的人類同胞息息相關、互融一體的一種體驗之愛（2）指出兼愛與周愛、盡愛、盈愛之相互相關關係如下：兼愛（等於周愛） $\supset$ 盈愛 $\supset$ 盡愛（其中符號 $\supset$ 表示包含）。何謂「兼愛」？張純一先生解釋如下：「所謂愛人不外己，己在所愛之旨。」張先生認為「兼愛」意指個人互融於全人類。「兼愛」是人類全體的同胞愛。何謂「周愛」？周愛之「周」即是周遍、普遍之意思。「周愛」指周遍的愛而言。「兼愛」常用「周愛」來表示。兼愛可說是普遍的愛、周遍的愛。「兼愛」與「周愛」時常互用之。例如《墨辯·小取篇》說：「愛人，待周愛人而後為愛人；不愛人，不待周愛，不周愛。」<sup>6</sup>其意是說愛人要周遍於人，不可偏私於人。所謂不愛人即為不周愛於人。「兼愛」作為「周愛」的使用之用意在於表現無條件的愛，全體普遍、無差別的人類平等大愛。同時兼愛不受時空限制。《墨辯·大取篇》：「愛眾世與愛寡世相若，兼愛之有（又）相若。愛尚（上）世與愛後世，一若今之世人也。」<sup>7</sup>即為明證。何謂「盡愛」？何為「盡」？《墨辯·經上》第四十三條：「盡，莫不然也。」<sup>8</sup>其中「盡」表示「物的量之全部」之意思，「盡愛」是從量的全部來看，指全人類的愛而言。接著來說明「盈愛」之義。何為「盈」？《墨辯·經上》第六十六條：

「盈，莫不有也。」<sup>9</sup>張純一先生解釋如下：「盈即圓滿無缺之義。」<sup>10</sup>高亨先生說明：「盈謂二者相函，有此則有彼，有

<sup>6</sup> 參閱焦國成著《墨子》頁 235 台北：昭文社 1997

<sup>7</sup> 同<sup>6</sup>，頁 233。

<sup>8</sup> 同<sup>7</sup>，頁 131。

<sup>9</sup> 同<sup>8</sup>，頁 69。

<sup>10</sup> 張純一著《墨子集解》頁 52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 1982。

彼則有此。」<sup>11</sup>綜合上述兩人說法，得知「盈」具有「相含、相依不離」之義，盈不同於盡。「盡」是從外延（extension）來看物之量的全部，而「盈」是從內涵（intension）來看物之的全部互容性，其中「盈」具有容積之特性。盈包含盡，但盡不包含盈。因此，「盈愛」指全人類互愛互融、相互關懷，包含盡愛。經過上述說明得出如下結論：兼愛（同周愛） $\supset$ 盈愛 $\supset$ 盡愛。

## （二）明理的辯論精神

墨家非常注重辯論的明理精神。他認為我們對於真理自悟（明理）之後就必須想辦法去悟人使人人皆明理，大家都講求客觀事實與公平公正，那麼社會就會安寧。有一分事實，就講一分道理。一切不說謊，「言必行，行必果」。他前期思想中把辯論的邏輯方法實際地應用在他的著作中，例如他所提出的六物式（辭、故、辟、推、援）的辯論法。<sup>12</sup>但到了後期，他把辯論提升為一門學問，稱為「墨辯」。它共有六篇（〈經上〉、〈經下〉、〈經說上〉、〈經說下〉、〈大取〉、〈小取〉），闡述辯學的意義、目的、辯證各種論證形式以及謬誤。此一方法在現今日常生活中很實用，又很有趣。尤其是他後期墨學

<sup>11</sup> 高亨撰《墨經校註》頁 69，台北：世界書局 1979。

<sup>12</sup> 〈兼愛上〉云：「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，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，當察亂何自起？起不相愛。臣子之孝君父，所謂亂也。子自愛不愛父，故虧父而自利；弟自愛不愛兄，故虧兄而自利；臣自愛不愛君，故虧君而自利，此所謂亂也。雖父之不慈子，兄之不慈弟，君之不慈臣，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。……是何也？皆起不相愛。」六物式的論證如下：1.辭：天下亂。2.故：不相愛。3.辟（同譬）：如父子、兄弟、君臣等等不相愛。4.侖：如父子不相愛，則父子亂；如兄弟不相愛，則兄弟亂。5.推：凡不相兼愛者天下亂。6.援：所以天下亂。

所提出「誹」字是由前期的「非攻」、「非命」、「非樂」、「非儒」之具有破邪顯正之「非」字演變成的。此「誹」一字凸顯出墨學伸張正義之聲的重要性。他一方面批判批「誹」之不正確論點，另方面奠定了辯論功用（以理取勝）之基礎。例一：《墨辯·經下》第七十八條：「誹之可否，不以眾寡，說在可非。」〈經說下〉解釋：「誹：論誹之可可，以理之可非，非多誹，其誹是也；其理不可非，雖少誹，非也。今也謂多誹者不可，是猶以長論短。」<sup>13</sup>此經文與經說文指出批評是否為對，其關鍵不在於批評多寡而是在於是否可以批評。如果按理可以批評，即使批評得再多，此種批評仍然是對的；如果按理不能批評，即使批評得少之又少，還是不對。例二：「〈經下〉第七十九條」：「非誹，非己之誹也。不非誹，非可非也，不可非也，是不非誹也。」<sup>14</sup>上述的經文及經說文指出「誹」是謬誤的觀點是可以被批評，但「誹」是糾正錯誤的言論，它是正確的言論，不可被批評。如果我們被批評「正確的言論」，這是不對的。

### （三）勤勞儉樸的績效管理

墨子認為賢才是管理哲學的一大庫寶藏。有優秀賢才，才能發揮積極性的「立竿見影」績效。領導者的職責在於選拔賢才，進而親近賢才重用人才，造就事業亨通順暢。〈所染〉篇云：「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嘆，曰：染於蒼則蒼，染於黃則黃，所入者變，其色亦變，五入必而已則為五色矣，故染不可不慎也！非獨染絲然也，國亦有染。舜染於皋陶伯益，湯

<sup>13</sup> 譚戒甫著《墨辯發微》頁 205 至 206，台北：世界書局 1979。

<sup>14</sup> 同<sup>13</sup>，頁 205 至 206。

染於伊尹仲虺，武王染於太公周公。此四王者，所染當，故王天下，立為天子，功名蔽天地，舉天下之仁義顯人，必稱此四王者。夏桀染於干推哆，殷紂染於崇侯惡來，厲王染於厲公長父榮夷終，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。此四王者，所染不當，故國殘身死，為天下僂，舉天下不義辱人，必稱此四王者。」<sup>15</sup>一個領導者能自動親近賢才，才是明智的行為表現。有了良好賢才，極佳績效隨之而來，以身作則。墨子提出「修身」的四大原則是（一）貧窮時要表現出廉明謙和（二）富貴時要表現出義行（三）對生者表現著愛心（四）對死者表現哀悼。墨子的管理方式是採取一種分層負責（下層對上層負責）的方式，一切講求思想統一、行動統一、義行統一、是非標準統一，才能發揮最大的效率來。他提出管理要歸納為下列五點：（一）廣納賢能之士，使賢才「名」、「利」、「權」三者具有一定之利益，專心工作，不可分心兼職。（二）視聽如神：〈尚同中〉：「得下情則治，不得下情則亂。」<sup>16</sup>管理合法合理。（四）賞罰分明，有罪必罰，有功必賞，如此才能做到「心服口服」之效果（五）愛護部屬：發揮「兼愛」之心。

總上所述，墨子的績效管理是一種實証、實用、實利的管理效果論，勤奮踏實做事，一切講求務實與時效性，很合乎現代人性的管理。

#### （四）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

墨子非常重視科學方法論。做事要懂得方法。《論語》書

---

<sup>15</sup> 孫詒讓著《墨子閒詁》頁10，台北：華正書局1987。

<sup>16</sup> 同<sup>15</sup>，頁71。

上說：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」有了正確的方法，才能事半功倍，否則事倍功半。尤其是他所提出的「由果溯因」法（有 A 有 B，而且無 A 必無 B，則 A 是 B 的充要條件或真正的因）對現今科學辦案具有很大的助益。墨家也注重事實的客觀性、邏輯性、實証性與實效性。他在前期思想中提出三表法（本之者、原之者、用之者）理論，到了後期，他不僅提出實証的歸納法，而且也提出與西方科學哲學大師巴柏（Karl Popper）的否証理論相似。這是一件非常難得的學術成就。《墨辯·經上》第九十九章：「止，因以別道。」〈經說上〉解釋：「彼舉然者，以爲此其然也，則舉不然者而問之。」<sup>17</sup>在此文中，「同」指爲在傳統邏輯中的全稱肯定命題（A 命題或 SAP）而「別」爲偏稱否定命題（簡稱爲 SOP 或 O 命題），此種否証的止類法是用 O 命題之「別」去駁斥 A 命題之「同」的一種推論法，例如說：假設「所有鳥是會說話」爲 A 命，「有些鳥是不會說話」爲 O 命題。吾人就舉「啄木鳥屬於鳥，具有鳥的性質，但不會說話」駁斥「所有鳥是會說話」之命題爲假。這與巴柏的否証法具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### （五）崇尚和平的大勇精神

墨子所提倡的和平運動口號是劍及履及，言行一致。他爲了「止楚攻宋」，走了十天十夜的旅程。他一切的行動基於正義之勇行，才能完成實現和平理想。到了後期，反而對「勇」概念作出明的界說。《墨辯·經上》第二十條：「勇，志之所以敢也。」〈經說上〉：「勇，以其敢於是也，命之；不以其不敢

---

<sup>17</sup> 孫中原著《中國邏輯學》頁 162，台北：水牛圖書出版社 1993。



於彼也，害之。」<sup>18</sup>他認為「勇」的精神在於說明人要立志敢行救世之事，不懼惡勢力，才能成爲一位有責任感的正義之士。因此，墨家的大勇義行精神值得我們效法與力行。

### 三、結語

我認爲墨家是一種「兼」的哲學：用「兼」來統攝墨家哲學思想內容（1）從知識論來說，其追求的是一種兼知（或稱爲兩知）。（2）在倫理學上，是力行兼愛（一種互愛互惠互助的普遍平等之大慈愛）。（3）在科學思想上，講求正知（實証的真知之全）。（4）從經濟思想來講，是一種利全（興天下之大利）。（5）從歷史觀來看，墨家追尋一種通變觀。（6）從邏輯思想來講，它是要求一種思想之全真。（7）在教育思想上，努力達到「義政」義行的理想目標。

因此，我們研究墨家一定要把它付之實踐，才不愧爲真正知行一致的知識份子。

### 參考書目：

1. 李殿仁著《墨家與當代軍事》，北京：中國書局 1997。
2. 孫詒讓著《墨子閒詁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 1987。
3. 梁啓超著《墨子學說》，台北：台灣中華書局 1985。
4. 梁啓超著《墨子學案》，台北：台灣中華書局 1985。
5. 梁啓超著《墨子校譯》，台北：台灣中華書局 1965。
6. 譚戒甫著《墨辯發微》，台北：世界書局 1979。

---

<sup>18</sup> 同<sup>9</sup>，頁 123。

## 墨家的時代精神

7. 姜法曾著《中國倫理學史略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出版 1991。
8. 孫中原著《中國邏輯學》，台北：水牛圖書出版社 1993。
9. 焦國成著《墨子》，台北：昭文社 1997。
10. 王讚源著《墨子》，台北：東大圖書公司 1996。
11. 崔清田主編《名學與辯學》，太原：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7。
12. 張純一著《墨子集解》，台北：文史哲出版社 1982。